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人物访谈】	陈昌浩最后的日子——访陈昌浩夫人孟力	冯亚光
【亡灵祭坛】	最后罹难者的启示——悼钱平华兼思索	仇伟立
【往事非烟】	《创业》风波	华 克
【春秋史笔】	“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罗 韬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人物访谈】

陈昌浩最后的日子——访陈昌浩夫人孟力

· 冯亚光 ·

陈昌浩早年参加革命，曾两次去苏联，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总政委。孟力，从小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她经组织推荐考进人民大学，1952年至1957年先后在人民大学俄语师范翻译系和北京俄语学院学习，正是俄语专业把她和陈昌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她因为深爱自己所学专业而舍不得丢掉它，经组织推荐由中国科学院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从而认识了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1965年7月和陈结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在陈昌浩最后的日子，她一直伴随在他身边，两人既是伴侣又是难友，共同经历了阴云的恐怖，苦难的折磨。笔者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同志，于2005年10月在北京红霞公寓访问了孟力。她回忆陈昌浩最后的日子，真实可感，令人难忘。

◇ 延安，重要的“密电”问题为什么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都可见到有关“密电”问题。造反派就“密电”问题，捕风捉影，借题发挥，无休止地围攻、逼供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三军造反派和全国造反派在三座门安营扎寨揪“军内走资派”徐向前，财贸系统造反派和全国造反派揪李先念。造反派对陈昌浩的批斗、逼供就更加残酷。

陈昌浩对孟力说：“造反派对‘密电’问题穷追不舍，‘密电’我和徐向前同志都从未看到过。这是没有的事，怎么能乱承认呢？造反派大喊大叫地批我为他们开脱罪责，‘想包庇他们过关，办不到！’”

当时，“密电”问题是完全可以把陈昌浩置于死地的“罪行”。这使孟力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她非常想了解真实情况。她直言不讳地问昌浩：“张国焘密电问题，到底是什么内容，怎么回事？”

昌浩说：“前敌指挥部根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既然是张国焘打给我和徐向前的‘密电’，为什么我和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呢？‘密电’只能是收报本人可以译的电报，我连看都没有看到，别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内容呢？”

昌浩接着说：“那时是战争时期，我和徐向前同志在前敌总指挥部，朱老总和张国焘在另一个地方，距离前敌总指挥部骑马也有好几天的路程，有事联系非常不便。毛主席和三军团在一处，离我们不远。我和向前同志负责右路军，张国焘在左路军，张国焘想要右路军南下，因此连发两份电报给我和向前，即：1935年9月8日晚上，以朱德、张国焘二人名义发来一份电报，大意是要我们右路军准备南下，并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接到这份电报，我马上送给毛主席过目，并请主席指示。由于我们没有即时给张国焘回电，张国焘紧接着在9月9日又来电催促右路军南下，我同样马上将电报送到中央驻地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见到我，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昌浩同志啊，咱们还是一起北上吧！’我很高兴地对主席讲：‘好啊！好啊！我和向前同志就是准备和中央北上嘛，但目前我们正在紧急地为解决过河造船，大约再有三五天就能把河那边的同志们都运过来，即可动身北上了。’

“在我与主席见面的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忽然发现和我同屋住的叶剑英参谋长的床是空的，人不见了。大家到处找也找不着，而且发现作战室里挂着的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不见了。我在想，他走的头天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同住在一个屋子里，从未发生过矛盾和不愉快的事，为什么不辞而别？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和徐向前正为这事纳闷时，许世友来电话很着急地报告：三军团他们怎么突然走了，而且还对我们放警戒！他非常气愤地请示我们：‘打不打？’我和向前同志都说不能打，徐向前同志大声嚷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我大声命令许世友和王建安不许打，赶快来指挥部开会。许世友可能没有听清楚，还在问打不打。我很恼火，气得连电话都摔了。当时，向前、先念都在场，还有几位警卫员也都在场嘛！”

“‘密电’是根本不存在的事，退一万步讲，假设张国焘真打电报要我们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就能听他的吗？如果‘密电’是真的，我们追随张国焘也有叵测之心，你好好想想，在三军团和毛主席离开我们，并对我们放警戒时，我们为什么不打呢？这岂不是实现‘阴谋’的极好机会吗？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完全可以证明事实的真相。还有，长征胜利会师后，在延安彻底清算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但是危害党中央、谋害毛主席这么重要的‘密电’问题，为什么只字未提？如果属实的话，为什么不揭出来清算呢？就这一条也可以给张国焘定上死罪了嘛！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我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和向前两人在大会做检查，主席说：‘主要是张国焘的错误，你和向前同志自己认识一下就行了，不必在大会检查了。’

“由于历史上的这些事，年轻人不了解，所以他们把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当作反中央、反毛主席路线的人，使原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受到严重冲击。造反派很想从我嘴里掏出他们需要的材料，我决不能顺从他们的逼供。我告诉他们：‘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同志们，在战场上是勇敢杀敌的好同志和英雄。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 每当回忆起这段惨痛的历史，我都痛心疾首！

1967年春，一天中午，中国科学院北郊大楼食堂门前贴出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很多人围观。大字报标题：“陈昌浩是西征途中的大逃兵”。孟力震惊了，挤上前去把大字报一口气看完。大字报的大意是：西征途中，在被敌人重兵包围，极端困难的紧要关头，身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不顾广大阶级弟兄的生命安危，弃军逃跑……。

孟力怀着不安和疑惑的心情回到家，急切地想问问昌浩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那天过了晚饭时间，还未见他回来。她非常不安，担心他被批斗后又犯了心脏病，会不会倒在马路上？陈昌浩1952年经中央批准由苏联回国，并把全部心血贯注在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中。党的八大期间，他组织全国最优秀的翻译工作者把大会文件及时地翻译成各国语言。为了抢时间，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用去了8年的时间卧床治疗。

孟力站在朝向院大门的阳台上，焦急地望着大门，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晚上9点多钟，昌浩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向院里走来，她赶紧跑下楼去扶他，着急地问：“你是不是不舒服，是心脏病又犯了吗？咱们马上去医院。”他向她摆手说：“不去医院，先回家吧，抽屉里有药，去医院也还是那些药。”他服药后就坐在桌子边一动不动，疲惫不堪，闭着眼睛。他是深思？还是痛苦？她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拍了一张照片，也许是想等他情绪好了之后让他看看自己，万没想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了他的最后留影。

昌浩稍事休息，精神有所好转，对她说：“造反派莫名其妙地给我罗列了一系列问题，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叛徒问题啦，什么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啦，长征途中的‘密电’问题啦，西征途中逃跑啦……”

孟力紧接着他的话说：“今天我在单位食堂门前看到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西征途中逃跑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昌浩声音低沉、非常痛苦，给孟力讲述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那段悲壮的历史。大意是：1936年10月底，我和徐向前同志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进行宁夏战役，我们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五军、九军、三十军西渡黄河，后来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取消了宁夏战役计划，命令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我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虽有2万多人，但都是与敌人经过激战后还未休整的部队，包括1000多名伤病号和1400多名女战士。河西走廊环境恶劣，南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边是沙漠和大山，很少村庄、很少人烟，不好建立根据地，无法扩充兵员。而对我军恨之入骨的马步芳、马步青他们集结了多于西路军数倍的精锐兵力，有精良的武器和很强的骑兵，妄图把西路军消灭在这块土地上。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西路军全体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并主动出击，共消灭了2500多敌军，当然我军伤亡也是惨重的。

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开始是“打通远方（苏联）取得援助”，后来因西安事变，为了策应河东部队，按照军委的多次指示，任务几经变更，因而走走停停，忽东忽西，逐渐丧失战场主动。敌军抓住西路军的弱点，更加疯狂地准备全歼我军，调集更多兵力反复向我军进攻，西路军又经历连续恶战，最后只剩下几千人，被敌军四面团团包围在严寒的雪山上。

昌浩讲到这里，流着泪，哽咽着，说：“我作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不能让几千英雄儿女在雪山上白白送死嘛！中央命令我们分散突围，可是面对敌人重兵包围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突围很难成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设法能让同志们冲出重围，想出一个办法来，利用当时敌军急于活捉我和徐向前同志，到处张贴悬赏重金活捉徐向前、陈昌浩的告示，将计就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一是缩小部队目标，二是返回中央向中央汇报。我军乘机分三路突围，由李先念和李卓然等同志指挥的1000多人不仅冲出敌人包围圈，而且将400多名身经百战的将士带到新疆，经过新疆带回延安。”

昌浩非常沉痛地说：“西路军的重大伤亡与失败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作为第一把手负有重要的责任。每当回忆起这段惨痛的历史，我都痛心疾首！我对不起英勇牺牲的同志们！”说着，热泪涌了出来。

孟力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给他倒了杯水，劝他休息。

◇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67年7月26日，昌浩一进家门就告诉孟力：“今天我在回家途中，看见彭德怀和张闻天被造反派五花大绑，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呈喷气式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完全像以前斗争恶霸地主一样。这样丑化我们党的干部，太不像话了嘛！这岂不是丑化我们党的形象吗？”

昌浩稍缓一下，激动而沉痛地说：“彭德怀和张闻天同志为党做了许多有益和有贡献的工作，是党内有威望的领导同志，他们的错误都是做过结论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这太残酷无情了吧。”昌浩紧靠在沙发上，流着痛苦的泪水，不断地仰面长叹……。

从昌浩的情绪中孟力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压抑着无法言表的悲伤和痛苦。她真为他担心呀，非要陪他去医院。他就是坚决不去，说：“我每天得按时去单位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如果我不在单位，他们会冲到家里来揪斗我，如果我在医院也会从医院揪出来，还会说我装病抵制运动。我只能带点药，有时带着药都无法吃，办公室挤得门都出不去。”

1967年7月29日，是孟力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昌浩手捂着胸口，迈着沉重的脚步，低着头晃动着身体，走进家门。一看就知道，他刚挨过批斗，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样子。她赶快用身体支撑着他，着急地问：“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他告诉她：“造反派轮番批斗，拳打脚踢，我恐怕很难支撑了。”他非常低沉而深情地喊着她的名字：“孟力，我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吃药也止不住，恐怕是很难好了！”她焦急不安地说：“赶快送你去医院治疗。”他摆着手坚决不去，说：“我要是住了医院，造反派就会给我扣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他深深地喘了几口气又说：“医院现在也很乱，如果知道我是被审查批斗的对象，是会被赶出来的。我先吃点药休息休息再看情况吧！”孟力给他服了药，赶紧扶他躺在床上，几次让他吃饭他都不吃。她想，休息一下也许会好一些，就没有再打搅他。

每天早晨5点起床，是昌浩多年的生活习惯，从来没有晚过，可这天过了半小时他还没有起床。孟力轻轻地进屋看他，他还在静静地躺着。她走到他的身边，摸摸他的头不发烧，推推他也没有动一下。她叫他，他不答应，她再叫，大声地叫仍不答应。她急得摇动他，他仍一动不动。天哪！昌浩莫非离开我们了吗？她焦急地要送他去医院，可文革以来电梯没有人开了。她赶快求邻居——昌浩的老战友郭述申同志的儿子们帮忙将他抬下楼，送北京医院抢救，但始终没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他离她而去了。

陈昌浩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在“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迫害下不幸去世。他带着满腔的悲愤却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悄然离去，离开了他的亲人、战友和同志，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祖国，他含冤而去！

昌浩去世后，孟力和孩子都被株连，家被抄，人被关，把她全家当作苏修特务隔离审查一年之久。

孟力，这位延安过来的同志，深信党对昌浩的历史问题会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从1972年至1979年的7年中，她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一方面是向党中央汇报昌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请求中央为昌浩在文革中被强加的不实之词，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平反昭雪。

1979年10月5日，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她亲自带着材料去见耀邦同志，汇报文革中昌浩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并请求党中央为昌浩平反昭雪。

耀邦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她，并耐心地听了她的陈述。耀邦告诉她：“孟力同志，你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信都已转到中组部了。你提到关于文革中昌浩的专案问题，中组部会重新审查的，关于昌浩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也一定会开的，你就放心吧！”

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的悼词说：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孟力看着悼词，流泪了。昌浩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 摘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

#### 【亡灵祭坛】

### 最后罹难者的启示——悼钱平华兼思索

· 仇伟立 ·

45年前的炎夏，“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大学西主楼门前，枪声响过，自动控制系8字班女生钱平华中弹倒地，时间是1968年7月18日12时25分。4个小时以后，救治无效，钱平华永远闭上了双眼。

9天以后的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人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结束了持续近百日的武斗。这9天当中，继续有人被枪击后受伤，但无人再遇害身亡：钱平华是清华“文革”两派“百日武斗”中的最后罹难者。

两个月后，被准予毕业并分配了工作的同学陆续离校。1962年入学的钱平华，原本也应该于此时和同学们一起走出校门，踏入社会。

钱平华没能走出校门，她23岁的生命以令人扼腕的方式结束在她求学6年的校园里。

钱平华于1945年8月11日出生在苏州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她前有一兄一姐，后有两个弟弟。因为子女多，钱家经济上并不宽裕，直到钱平华的哥哥参了军，情况才有好转。虽然家中拮据，父母还是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钱平华自幼聪慧，高中就读于江南名校苏州高中，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时，刚满17岁。

自动控制系是清华大学于1958年成立的5个新技术系之一，主要为国防建设培养技术人才。全国各地很多优秀学生考进系里，原来在高中时都是各自学校的学习尖子，此时集中在一起，免不了产生更大的压力，进而化为动力，学习倍加刻苦努力，钱平华也不例外。

她的班长回忆，她生性好强，依当时的说法，虽在政治上被认为“不太开展”（通常指没有积极要求进步，如申请入党），但非常在意学习成绩的排名，并常常为此纠结。实际上，她学习成绩不错，曾进数学提高班，担任班上的数学课代表。深藏在性格中的好强执著，也许是日后明知校园里已响起枪声，她还坚持回校的动因之一。

1962年秋季入学的自控系8字班同学，亲历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又在经济恢复的曙光中迈进清华园，对党和领袖充满信任，钱平华是其中最为真诚者之一。她对党组织的教导无比信服，时时检讨自己思想上的“差距”。在工厂实习时，她从内心感谢学校提供了向工人师傅学习的宝贵机会，放弃休息，请师傅“开小灶”，认真实践，多学技术。在部队军训时，为了射击取得好成绩，她在规定的午休时间加班训练，感动了部队战士陪她练习，帮她“违反纪律”。对于国家的每一个辉煌成就，钱平华都从内心欢呼雀跃。据蔡一寰在纪念文章《永远的痛》中回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清华，游行的同学在校内形成了沸腾的人流。钱平华冲下宿舍楼，激动得和她抱在一起又蹦又跳，穿着拖鞋就要参加游行。

钱平华很善良。蔡一寰回忆，同学发烧呕吐，她帮助又擦又洗毫不在意脏了自己的衣物，她们俩一起把病人迅速送到医院，医生感叹“送得及时”，生病的同学避免了罹患脑膜炎后遗症的危险。蔡一寰还回忆，钱平华生病，被她背去校医院；日后钱平华不过意，笑着非要再背背她不可。钱平华常常手拎三四个暖水瓶，坚持为全宿舍同学打开水。男同学饭票不够，她主动向女同学“募捐”，把饭票及时送到男同学手中。

钱平华感情丰富而细腻。她来自美丽的苏州，经常自豪地赞美家乡和母校，怀念亲人和同学。她参加了学校的评弹组，自弹自唱博得了同学们的喝彩。对此，胡贵云在《缅怀钱平华》一文中有生动的回忆“她怀抱中阮，带着金属指套的纤纤手指，一边轻拂琴弦，一边曼声儿唱着：‘雷锋呀，你处处为人民，毫无利己心，你是那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琴音一会儿轻柔如小桥流水，一会儿又急促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而她的声音则于纤细柔弱中透露出几分刚强。”

钱平华又是脆弱甚至带几分娇气的。学生宿舍一度臭虫成灾，女同学中，皮肤细白被戏称为“油豆腐”的钱平华耐受力最差：她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觉，痛苦不堪，半夜里跑到走廊里低声哭鼻子。

钱平华也是天真的。她从家乡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即7月18日上午，曾去北京市革委会门前，从同学那里听到了清华园内已响起枪声的消息。她执意回校，不相信子弹会射向她这个赤手空拳的女生。

真诚而执著、善良而天真、温柔而脆弱的钱平华之罹难，酿成了清华“文革”两派武斗中的最后一桩血案（日后工宣队进校时更令人震惊的血案不在其内），案情并不复杂。钱平华持一派观点但并非武斗队员。她用哥哥的部队复员费买了车票，从家乡返校，想回到本派人员占据的教学楼里。7月中旬晴朗的天空，灿烂的正午阳光下，她手无寸铁，身着简朴的衣裙，外表女性特征明显。前文提到，尽管当天上午在北京市革委会门前已经听到校园里响起枪声的消息，她还是天真地以为枪口绝对不会对准自己这个赤手空拳的女生。射手共打了三枪，前两枪没有打中。钱平华在第二枪响起的时候迟疑了一下，但既没有卧倒也没有快跑，而是继续前行，想必当时还是不相信子弹会射向自己，直到被第三颗罪恶的子弹击中。

接下来4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唐金鹤在《倒下的英才》一书中有详细完整的记述。躺在离楼门口不远处的钱平华被唐应武抢回，背到西主楼过街楼下的平板车上。经校医院大

夫简单包扎后，用汽车赶紧送往北医三院。途中她神智尚清楚，轻声呼唤护送的同学，睁开眼睛时留下了人生中最后的微笑。三院医生抢救时，钱平华已无血压，下肢失去知觉并有气胸。X光片显示，子弹从左肩打入，从右后背穿出，但外面看不到流血。在人工按摩心脏，人工呼吸，输液输氧均无效后，钱平华的心脏于下午4时25分停止了跳动。中弹以后至闭上双眼之前，钱平华很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伤势即将危及生命，只说了一句“好疼！”

过程简单，但有值得注意的细节。

在钱平华遇难前半小时，已经有两个从市区返校的人遭到枪击。而在钱平华之前，又有一骑车人从主楼前广场进校时被枪击，而且不止一枪，只因速度快未被击中。

这几个被当作靶子的人并无任何派别特征，当无从判定他们是某一派的人还是住在清华但并未参加两派武斗的人。这就是说，射手们的枪口是瞄准平民的，是对准除本派以外所有人的，目的是封锁交通要道，使紧张局势升级。

而据唐金鹤记述，她自己日常进出清华，常身穿和钱平华相似的衣裙。7月18日黄昏，她从市区返校后，有同伴惊呼：钱平华穿了你这样的衣服，被打中了。因此唐认为射手们很有可能把钱平华误认为是她。但就算是唐从本派占据的楼里进出，她最多也就是个“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女性。

射击平民，射击女性非战斗人员，战场上的狙击手亦不为之；除非丧心病狂，狠毒至极。

还不止于此。如上所述，至钱平华遇难，射手共打出了五六枪之多，这五六枪当不是一人所射。这一细节迄今没有资料提及，只是称“有好几支枪瞄准，只有一人扣动了扳机”（见沈如槐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第401页，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而据自8同学回忆，工宣队进校后查明，射向钱平华的三枪系三人所为。射手A没有打中，射手B接手，仍未中，于是射手C登场。后查明，射手C是精密仪器系0字班学生，是北方名校天津耀华中学的毕业生，似乎还在射击运动方面颇有天赋。曾经的优秀生，手指一动，就此化为凶手。

如是，加上射向钱平华之前的那几枪，无疑可以证明射手是个小群体。钱平华血案，是群体作案，是若干个射手在追杀目标，只不过打中的仅一人，其他射手技不如人而已。说“只有一人扣动了扳机”，其实并不准确。

还有一个细节似乎更值得关注。在唐金鹤的记述中，抢救钱平华的唐应武回忆，当他奋不顾身背起钱平华往回跑时，又一声枪响了，子弹好像从耳边飞过。他腿一软，和钱平华一起倒地。稍后感觉未被击中，于是赶快和另一同学一起把钱平华架到枪击不到的地方。

射手们朝救钱平华的人也开了火，只不过没有打中。至此，又增加了罪恶的一枪。

唐金鹤说到，清华校友网上曾有一段留言，称救钱平华的人“穿了武斗服”，所以又被枪击。但据唐应武陈述，自己当时根本未穿什么“武斗服”，穿的是一件衬衫，一般的学生服装。唐金鹤气愤地指出：这段留言许多人看到了，但没过多久就被删去；删者不是开枪者，就是瞄准者，起码是知情者。刚打倒一个，又想再杀一个，心真够狠啊！即使穿了“武斗服”，去救人，也往死里打吗？还有人性吗？

唐金鹤还痛心地说，40年后，还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让人心寒啊！

细节说明问题。

群体作案；射击平民；射手无寸铁的女性（而且是毫不留情、必欲置人死地的追杀）；更骇人听闻的是射击救死扶伤的人。几十年后还死不认错，绞尽脑汁为自己开脱，还有人性吗？

关于人性问题的考察，就这样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多年来，“文化大革命”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研究者几乎穷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找到的观察视角。史学家们，以及亲历者、反思者、热心研究者无论持何种观点，在这个日渐多元化的语境里都有不凡的贡献，当然前提是要基于史实。所以，那些锲而不舍追寻真相的人，真是可钦可敬。

基于人性去思索，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视角，但也不可或缺。

曾几何时，“人性”是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语词之一，“人性论”的帽子真的是重于枷锁。“哪个阶级的人性？”的诘问在各种大批判中都能最先抢占制高点。但是，时代毕竟前进了。现已无人公开质疑“以人为本”，若在“文革”中，一句“以哪个阶级的人为本？”就能掀起又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现在，我们可以从人性的视角观察钱平华之罹难了。

主流哲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等理论工作者们现在已就“人性”问题基本上有了共识（至少公开是这样）：人的本性中，既有善性，又有恶性；善恶二重性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人性，人人如此，没有例外。

人性中的人欲，应该予以承认、有限度地满足，适度利用并加以限制。如不限制任其膨胀，就会发展为恶性大发作。但恶性又不能根除，只能用法律、道德和理性去约束，所以人性需要教化，也就是说人需要受教育，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教育。人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升人性中的善性，将善性内化为操守，外化为习性；对恶性则要形成共识，共同抑制、约束，减少作恶。

钱平华遇难及救治的全部过程中，参与抢救的所有同学，尤其是唐应武身上显现的人之善性，无疑最有光辉；但最值得探讨的，恐怕还是射手们的人性。

射手们的人性中，不能说善性已经完全泯灭；但射击的一瞬间乃至前前后后，恶性已经膨胀以至充斥他们的头脑，主宰了他们的行动。他们难道没有想过，他们瞄准的目标，也和曾经的自己一样，满怀着求知报国的理想，承载着父母亲人的热望，经过多年苦读才迈进清华大门？他们肯定清楚地知道，只不过这些信息被视生命如草芥，视杀人如儿戏，对击中目标充满强烈的“成就感”等等更强的恶信号所屏蔽，终于在瞬间完成了从“射手”到“凶手”的转换。这转换中又发生了何种心理变化？是如今一些学者所说的“逞能型冲动”“青春期激情发作”吗？扣动扳机的那一刻，用“积极响应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以及“捍卫革命路线”等等说辞显然也难以让人信服。

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所谓“一念之差”的说法过于简单。



所以，深究一下“恶性如何大发”这类问题还真是有意义。

老作家巴金在《随想录》里多次发问，表示困惑：

“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

“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类似的发问在《随想录》中还有多处，但似乎未见回答。

有意思的是，近年有人著文为“兽性”鸣不平，说就残忍、贪婪、耍阴谋、妄图独霸一切等人的恶性而言，野兽的“兽性”远远不及。把人作恶喻为“兽性大发”，是对野兽的侮辱。想必巴金老人生前未闻此说；若与闻，多半他会表示同意并对自己的说法稍作修正。

社会上的关注还经常见于各种报道，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现身道歉。

网传有“文革”中曾伤害过别人的刘伯勤作出忏悔：“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态度非常真诚。然而原本并非恶人，怎么就作起恶来了呢？没有往下细说，看样子也在求索。

其中的“裹挟”之说，就是指在当时当地的氛围之中，被动地“从众”了。“从众”，是中国人国民习性特点之一，“裹挟”说很有些道理；但也难以解释形形色色的现象。比如钱平华案中，射手们并非被“裹挟”而身不由己，而是颇为踊跃地在“比赛”射击技术，为满足于射中目标的“自豪感”而竞相去“立新功”。

善良的大众也常常不解，用一句朴素直白的“怎么下得去手？”来表达困惑。

可见人如何被恶性主宰这个问题一直在被很多人探究；但迄今答案尚不清晰。追寻答案的意义何在？还是巴金的话：

“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

探究人之恶性发作的机理，堵死或基本堵死人之恶性上升、膨胀的路，庶几可以大大减少“再来一次‘文革’”的冲动和最终“再来一次”的可能性，甚至可能从悬崖边拉回相当一批潜在的“射手们”，或至少可能让血腥和暴力渐渐远离。是不是可以“治本”呢？恐未必。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事件，其发生自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以及国内、国际的种种背景条件。条件一旦具备，史学家们的所有“警示”都会败下阵来。

可是仍然不能放弃。“不放弃”蕴涵着改变那些条件的可能性。

求索还要继续。求索的过程本身就是减少暴戾之气，将人之善性发扬光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当全社会都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时候，理想中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到来。

大恶均由小恶累积而来。其实人之恶性大发作，开枪射杀同学、残害无辜（包括使用酷刑）只是“文革”中的一种极端行为，并未充斥整个“文革”期间；否则“文革”早已不可收拾，断不能持续10年之久。更为常见的、表面上比杀人要“小”的、在“文革”中时时发作的恶性，是制造谎言、谣言，行骗术、不择手段和耍阴谋诡计。一些人将这些“技巧”付诸实践，运用娴熟，尤以少数首领人物为甚。而今已公开出版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大约“文革”时还没有传到清华园（也许有人读过？存疑），但个别人竟然在短时间（不超过两年）内无师自通地参透了那些连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要研习一生去领悟的权术之道。“政治无诚实可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仅内涵相通，连字面都无二致，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小小年纪便如此老到，真成了气候不可怕么？然而“道”又从何而来呢？不少我辈同龄人曾大惑不解。

但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也不是无迹可寻。譬如本是写给军事统帅的兵书《孙子兵法》，宗旨为“兵以诈立”，生命力最强，“文革”至今在各领域都被“活学活用”，奉为圭臬。又如“三十六计”，计计都是骗术，现在堂而皇之活跃在商战、职场等各“战场”上，甚至朋友、熟人之间，使社会良知、道德底线若隐若现，无所措手足。

“谋略文化”“权谋文化”从大众社会生活中淡出之日，或许就是人性中之恶性被釜底抽薪之时。建设现代文明国家，对那些隐含着恶性基因的所谓“传统文化”不能不加以重新审视。这样思索钱平华罹难并发掘启示，当不能说是离题。“几支枪同时瞄准开火，查不出是谁打的”，其“谋略”虽算不上高明，却也足以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清华“文革”中生成并流传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几句“高论”之一。据唐金鹤在《倒下的英才》第314页记载，著作权者为何人迄今尚无定论，但完全杜撰、子虚乌有的可能性也不大。）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自诩为“革命左派”的张狂；号令“三军”时叱咤风云的气势；被利用而不自知、满以为从此步入了高层政治的幻觉等等，早已成为过眼烟云。该是冷静下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如果此时尚不能坦诚地面对真实的历史，面对在畸形文化中形成的种种恶性，那真是让人无语了。

如果说人之恶性发作的内在机理尚在探求之中，诸多深层次、纯科学问题可以暂时绕开，那么“造成恶性发作的外因何在”恐怕是下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前文提及，人性是要教化的，要用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现代文明去教化。人性出了问题，推论之一当然就是教化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这题目过于宏大，求精确解很难，众说纷纭，各有道理；但有一点如今恐怕无人公开否认，那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教育对人性的成长有重大误导。

新中国成立以后，构建社会成员间的新型关系（包括教育）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重大课题，本应与时俱进。可惜的是，阶级斗争教育一直延续下来，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越来越激烈”的思维指引下“发扬光大”，至“文革”时期登峰造极。所谓敌对的阶级、人，乃至思想、意识（包括不分阶级讲人性）不断被制造出来，统统被列为必须“横扫”的“牛鬼蛇神”，异类分子生命的消失理所当然。这种“融化在血液中”的“阶级仇恨”，成为“文革”中打人、杀人凶手们“洗红”人性中之恶性的强大精神支柱。

射向钱平华的子弹（打中的和没有打中的）背后的有恃无恐，在这里可以找到重大答案，虽然不是唯一的。

所幸阶级斗争教育已经走进历史；但这并不说明现在的教育释放的百分之百是正能量。当今大众普遍认为，我国学校的、家庭的、社会的教育都有缺失，都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学校教育，竟被概括为“应试教育”。都说有问题，又都无可奈何，目前尚不知如何解套。

大环境更不容忽视。如今“阶级出身”的阴影已悄然褪去，贫富悬殊，以及权势之大小、权势之有无形成的身份歧视又有大面积泛滥之势。社会流动性日益减弱，身份似在固化，底层对地位上升失去信心等等现象，成为人性中之恶性滋生的隐性元素。“谆谆教导”“苦口婆心”抵挡不住现实的残酷。善性教育，何其难啊！可是不但不能退却，还必须知难而进，否则民族、国家的出路何在？

行文至此，一个更为严峻的话题同样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约束恶性、提升善性的问题吗？

恐怕不能。最终答案还是要建设现代法治社会。详论这一更为宏大的题目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和笔者的能力。

钱平华的青春年华在23岁时就画上了句号，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剧全然不该发生，令亲人和同学们痛心不已。“太不值得了！”是众人扼腕、谴责凶手时的又一声叹息。“不值得”似乎就是无意义了；可是当真无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而且套用一句老话，可以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钱平华是清华两派百日武斗中的最后罹难者，当时这一残酷事实肯定会上报、上达，虽然很可能只有“清华又开枪打死了一名女学生”之类简短的一句话，略去细节，不会详述，但给制止武斗的高层决策又增加了砝码应该是没有疑义的。9天之后，工宣队以血的代价进驻清华，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宣告了全国红卫兵运动退出舞台。这样看来，钱平华罹难或许是压垮造反派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这是钱平华罹难彼时的“现实意义”，能说不“重大”吗？

45年以后，在反思清华“文革”的时候，钱平华罹难是绕不过去的事件。它让我们思索何以“人化为兽”，又进而领悟提升人之善性、抑制恶性之道，以及人的教化之道。虽不能“立”至，但心向往之，有愿望就有希望。当全社会对树立公民意识，对“以人为本”真正达成共识并身体力行的时候，谁能说钱平华罹难和我们得到的启示无关呢？

这是钱平华罹难此时的“历史意义”，能说不“深远”吗？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钱平华长眠在家乡苏州父母墓边。她大概不会想到，她年轻生命的付出多年后还会被认为如此地有价值。并不是每个普普通通生灵的逝去都能给活着的人带来启示和思索，钱平华在天之灵，不知可否由此得到些许安慰？

自动控制系在清华百日武斗中有两位同学罹难：自8的钱平华和自9的谢晋澄。谢晋澄同学我不熟悉，但他遇害的那一刻映入过我的眼帘。我本人坚决反对武斗（而且对武斗得不

到及时而坚决的制止长期迷惑不解），自然不会去参加；但对武斗队的命运还是非常关心。4月29日那天，我在12号楼宿舍窗前紧张地注视着两派武斗队员列阵、对峙，目睹一辆卡车先是撞倒了一位同学，然后又从他身上轧过。遇害同学的遗体被同伴拖到12号楼下，只听楼上同学喊：是谢晋澄！随后赶紧扔下被子盖住了他。就在那一刹那间，我看清了那张被重力碾轧后完全变了形的脸，比后来在北医三院太平间看到的钱平华遗体被大冰块（那时还没有电冰柜）压变形的脸可怖得多，其惨烈程度不忍在这里细述。“文革”结束后的好多年里，那两张变形的年轻面孔还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

近几年，社会上对“文革”议论不断。有人怀念“文革”时期短暂存在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应该说还是满怀善意，虽然颇有些一厢情愿的天真。但另有人则不同，居然呼唤再来一次“文革”。什么人这么想呢？据分析有造反没有造够的人（作家梁晓声在其文集《忐忑的中国人》中以“难以撼动的暴劣本性”为题对此种人有非常精彩的描述：“盼着哪天再搞一次，铁帚扫而光！”），又据说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腐败的痛恨，认为只有“文革”才治得了贪官。这真是一个良好而又无知的愿望。“文革”是什么？那自毁阵脚自捣根基，那对文化的大摧残，那无政府主义大泛滥，那人之恶性大发作，那“天下大乱”，那残忍血腥，今日还能“再来一次”吗？如果再次如当年“天下大乱”，还有谁能如当年领袖最初设想的那样收放自如、“达到天下大治”吗？何况即如领袖那样的雄才大略，最终“大治”也并未到来，而是使国家几乎陷入深渊。

钱平华离世后的45年中，外系同学在多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她的遇难。作者们满怀正义感和责任感，记录了历史，抒发了对她的悼念之情，这使自8同学深怀感激。钱平华罹难，正如曹友治在清华百年华诞时撰写的《不能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说“代表我们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苦难”，又如蔡一寰所说，是自8同学“永远的痛”。钱平华遇害时，没有自8同学在现场参与抢救，这使自8同学痛上加痛，长期不安。作为同窗6载的自8学友，总该为钱平华做点什么吧！但钱平华的双亲已在她遇难不久后离世，实际上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只剩下了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本文。文之副题有“兼思索”字样，但因缺乏思想深度，思来索去也就只能写下上面一些话；而且还没有想得很明白，离“反思”更差得远。

虽如此，总算是为钱平华做了点什么。

努力之下，还是做得不够好；但想做好的心是真诚的。

致谢

关于钱平华罹难全过程及有关记述，均引自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1月修订版）第308页—第314页，谨此致谢。本文还引用了自8曹友治、胡贵云、蔡一寰等诸位同学的文章，又承以上各位同学提出宝贵意见，另承周曼灏、刘芬著同学提供和钱平华的合影，一并致谢。

2013年10月

补记

本文在悼念学友钱平华的同时，试着思索了人性善恶及其转化问题，但最终仍觉不得要领。直面大背景下的恶性事件需要勇气，身涉其中的普通人常为自己也需要承担一份责任而纠结不已，别人对于其角色、作用，以及动机的观察很不容易到位。

近日读随笔集《观念的水位》（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作者刘瑜就职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其中一篇《恶之平庸》有两段精彩的话（第016页—第017页）：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而所谓人性的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我、你、他，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让这些话入耳？

前文说过，未及时休止的阶级斗争教育是误导人性成长的重大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这另外的原因就要从个人身上去找，各有各的责任。不然为什么都在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偏偏是你上去开了枪？

当然，钱平华血案中曾经的射手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有权利拥有新的生活，任何人不可再往人家伤口上撒盐；但是要让当年的所作所为不留痕迹也难。正如皮肤扎了毒刺，虽然刺被拔出，但伤口常久不愈合，甚至留下终生不退的疤痕，这正是历史的残酷。

如此，在悼念亡灵的时候，我们可得到如下警示：

时时审视自己的人性，是人生必修课。  
底线不能越过，尤其是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有的事不能做，特别是危及人生命的事；  
无论目标看起来多么崇高，口号听起来多么响亮。

2014年5月

作者简介：仇伟立，生于1943年，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8年毕业，为钱平华同级学友。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往事非烟】

《创业》风波

• 华 克 •

1975年春节至9月间，一部表现石油会战的电影故事片《创业》从公映到被禁演，成为当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中发生的一个突出事件。我作为当时该片主创成员与《创业》蒙难的亲历者，对40年前遭到江青训斥引发的沉重感迄今难以消散。

◇ 震惊国人的禁演

《创业》影片还未开拍，当时的文化组（即后来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刘庆棠在审看剧本之后，便传出告诫：“这是江青同志抓的重点片，一定要拍好，拍出水平，不可掉以轻心！”

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出我这个年轻的副导演奔赴大庆，深入生活，组织剧本创作。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钻井队板房整理素材，忽然值班员跑来，说长影厂领导有要事找我通话。在电话里听到老厂长苏云告诉我，最近江青对大庆题材的电影创作有了指示，厂里决定让我赶快回去。得此消息，我喜出望外。虽说我们创作组对会战功臣已访谈了上百名，各类资料已累积300多万字，可是，像大庆会战的大题材，如果没有权威的创意指导来引领创作，只怕难于进行概括与塑造典型。如今既然江青发话，大概有门儿了！

回到长影会议室一看，顿时一愣：到场的不仅有曾被打成“黑笔杆”的编剧张天民，挨过批斗的导演于彦夫，还有摄影师、美术师以及服、化、道人员多名，一个强有力的摄制组俨然已组成。主持开会的，是先前的长影军代表、而后的厂革委会主任。他一开场便传达江青指示，原话是：“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的，王铁人是站得住的。《中国文学》这篇文章很好（指其载报告文学《王铁人的故事》），可以这个材料作为基础。不要写真人真事，不要用铁人的名字，用他的材料。不要局限在大庆，多跑几个地方，视野开阔些，要塑造典型嘛。”最后还有一句：“要从玉门写起，这是历史。”

所谓“这是江青同志抓的重点片”，其源盖出于此。

《创业》第四次修改的声画合成样片文化部已审过，1975年1月31日报送钓鱼台。王洪文看后批示：“总的感觉这部片子拍得是好的，拟同意上演。请春桥、江青、文元同志看。”张、姚看后都点了头，画了圈。后台老板江青据说近日感冒，不看了，请会咏定。不过，圈还是画了。这就等于说：影片通过，她已认可。

很快长影接到通知，为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与欢度春节，文化部决定《创业》作为重点影片在春节期间上映，并向国外发行。于是全厂职工日夜加班，赶印拷贝，抢时间向全国发送。

2月4日，中国电影公司向全国各地发出“彩色故事片《创业》宣传要点”，根据高端审查意见列了5条，评价甚高。

2月9日，新华社发出电讯稿称赞影片。

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消息，报道优秀影片《创业》即将在全国上映。同日该报第四版刊出5幅剧照和大幅广告。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电影《创业》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正式上映。观众看后反应之强烈，盛况空前，给长影创作者带来了欢笑，给石油创业者们送来了温暖。

然而，《创业》在全国上映后的第三天，长影突然接到中国电影公司不带任何解释的通知：“影片《创业》停印拷贝，停止宣传，停止向国外发行。”三停！与此同时，新华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影发行公司也接到通知：《创业》停止评介，剧照追回，给所有单位和所有人来了个“冷不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影以苏云为代表的领导们急得团团转，全厂上下如坠五里雾中。为尽快得到消息，只好四处打听。好不容易从北京一个渠道探来了实情：是江青在春节看了《创业》，她看后很生气，喽喽们见势不妙，赶快下令停映！

◇ 荒唐透顶的罪名

江青对《创业》发难，简直荒唐得离谱。据张天民讲，江青初见《创业》送审报件时，还没有工夫和心情看影片。此时的她，正在为四届人大组阁失败而恼怒，为毛主席批评她搞“四人帮”而沮丧。在心烦意乱之下，既然看到帮内要员已审查画圈，并且还有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赞扬，想必此片还不错，因而也就难得来一个高抬贵手，放《创业》过关。天民还告诉我，另一方面，江青对《人民日报》用大幅版面赞扬《创业》很窝火，她就是在这时调看影片发泄不满的。真实情况是，江青第一次看片还没看完，就气得拍案而起，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后来怒气难消再次看片，越看越生气，忍不住连连叫喊：“这不是艺术问题，是政治问题！”更扬言：“要组织人座谈，写文章，要批判！”

问题在哪里？批判什么呢？一开始，江青把她捕风捉影的所谓发现，让喽喽去猜谜，弄得文化部的人蒙头转向。于会咏如五雷轰顶，刘庆棠六神无主。其实，江青这时只是在卖关子，她发现的“问题”，无非是淤积在胸的怨气和怒气，找到了《创业》这个出气口。至于如何借此发难，因为没抓住什么把柄，她先拿大帽子吓人，制造一番紧张气氛。随后，从一位在军界“放火烧荒”的武秀才那里得到一份分析材料，炮制出来了关于电影《创业》的10条“意见”。

江青在四届人大组阁中夺权未遂，受到重创，她所记恨的余秋里、康世恩，不仅没有被她打倒，如今还被委以重任（余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康为石油化工部部长），并且有周恩来的呵护，还有死对头邓小平的撑腰，她恶气填胸，急不可耐地对《创业》挥刀乱砍，把讴歌周挺杉、华程形象，诬为给余秋里、康世恩树碑立传，进而称该片“是以写真人真事赞颂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在抛出10点意见之前，他们先采用逼供法，一而再、再而三迫使剧组揭问题，写检查。剧组明知他们是要“自供材料”，干脆来个软磨硬泡。近两个月，想钓的鱼一直没上钩。眼看再拖不行，于是在当年4月3日，一道金牌，把吉林省领导和长影人员调到了北京。在纪律森严的氛围中，刘庆棠宣读了以文化部核心组名义发出的“关于电影《创业》创作的10条意见”。至此，江青对《创业》做了正式宣判。

物极必反。《创业》蒙难，一下子把张秀才逼急了。平常看张天民文质彬彬，但事关影片《创业》的命运，他不甘心服软。不过，他此时一直猫在北京，两个月不见踪影。忽而7月中旬我在厂里碰见他正跟别人谈笑风生，颇感惊讶，于是我问他：“喂，张兄，你心情好些吗？”他顺手拉我到路边，悄声告诉我：“华克，你等着，再过几天，最多不出半个月，会有大好消息传来！”我忙问：“是有关《创业》的事吗？快透露透露！”他笑而不答，转身走了。果然只过了7天，一声惊雷在长影大院爆响！毛泽东7月25日对电影《创业》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泽东”

多日后，天民才向我透露上书内情——正是在邓小平关注文艺界动态、启动整顿的时刻，由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等跟他秘密联系，把告状信送到了中南海。

◇ 突如其来的召见

1975年9月14日午夜，我在睡梦中听见敲门声。来人匆匆把我接到苏厂长家里，与先到的几位剧组成员一起聆听老厂长刚从省委开会回来的传达，即：省委通知《创业》组主创人员15日跟随省委王淮湘书记飞往北京，具体任务到京后再告详情。于是我们一行9人怀着神秘兮兮的揣测，在翌日抵京后被送往京西宾馆，同从大港赶来的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会合，据说是等候中央首长接见。大家闷等了大半天，谁也没猜出接见者是邓小平，还是江青。直到晚上7点钟王淮湘把我们召到房间，告诉我们：“江青同志现在山西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她要我们到大寨去，可能有重要指示。具体什么情况，没有对省委讲，到了那里就知道了。到大寨后，首长问到什么，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总之，要认识到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对文艺革命的促进。”

至此，悬念虽被解开，但又不明白：江青沉寂了好几个月，这时突然现身大寨，把我们叫来到底是为什么？夜深人静，苏云和张天民一直在揣摩：“她此时召见我们，难说给什么好果儿，肯定凶多吉少！”

9月16日午后5时许，长影人被领进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大寨分社。我们在院子里碰见了一群熟悉面孔：北影导演成荫，剧作家孙谦，著名演员张平等。老同行见面，大家握手言欢，但对是来开会，还是被接见，均不得要领。活跃的张平是老“东影”（东北电影制片厂），他向老友们透露：这次被召来的人，除了《创业》剧组，还有北影《山花》摄制组（拍大寨题材）；另有诗人张永枚，北大教授林庚，以及文化部录制昆曲的上海演员们，少说五六十人。他问于彦夫：“伙计，知道是怎么叫你们来的吗？”老于摇摇头。张平说：“前天江青正吃饭，忽然一激动，从昔阳学大寨会议上，调来了吉林省委二把手阮泊生。她先对《创业》作者骂了一通，捎带责备吉林省委不重视路线斗争。接着发令，要阮给吉林省委打电话，调《创业》组人员到大寨，特别是编剧张天民，一定让他来！”

这时不知谁喊一句：“来了，首长从虎头山拍照回来了！”拥在餐厅里的人都站起来，眼睛齐望门外。门开，江青由警卫、护士，还有于会咏、浩亮一帮簇拥着，旋风般走了进来。她披着上衣，半边镜框里的眼神透出不可一世的威严。不等文化部长介绍，她迫不及待地第一句话便问：“张天民来了没有？张天民呢？”

大家倏然一惊。张天民像是被谁推了一下，冒了出来。他不卑不亢地走近江青，轻声应道：“我是张天民。”江青锐利的目光直盯这位上书人的面孔，她边握手边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张天民刷地红了脸，很快又镇定下来。而江青说完把手一甩，径直走到一张餐桌前呼叫：“吃饭，吃饭！”又赶快招手：“王淮湘，成荫，孙谦，都过来！张天民，你也过来！”

被叫的人先后就座，长影人聚在邻桌。江青环视大厅，说道：“今天，请你们来，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撒尿，四听我说话！”此言一出，语惊四座！谁也没想到，这种不雅粗言，竟出自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口！接着，她向张天民发难，话劈面而出：“小张，你给主席谎报军情啊！”张天民软声答辩：“我没有谎报，信上写的都是事实。”江青没有听清，指着于会咏、浩亮，唠叨起来：“《创业》样片我还没看，他们就给我吹，片子如何如何好。我看了几次，看不下去，镜头跳跳蹦蹦。张天民，我告诉你，主席说片子没大错，但

是没有说你这里没有小错，中错！懂吗？”转而切入要害，“那10条意见不是我的。我只对其中第八条负点责任，是讲艺术处理的。别的，都是那帮蠢材们搞的，和我没关系！”

江青对长影人说：“你们的片子太粗，对话多，构思不讲究。今晚我要给你们看一部影片《康贝尔王国》，学学人家怎么写石油……”她说着转向张天民，“娃娃，你概括能力差，我给你找个合作伙伴——孙谦，认识吗？”张天民立刻回应：“熟人，我的老师！”江青高兴了：“好啊！我看你这部片子就算了，不管它。咱们再搞一个新作品，怎么样啊？”听到这句话，张天民和孙谦对视了一下，嗯嗯两声没接话茬。

唠叨的江青忽又发出责骂声：“这个谢铁骊，钱江，没良心！用伊思曼胶片拍低密度曝光，他们开始不懂，是我手把手教他们。可是他们不听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回过头来，因为批评了他们的影片《海霞》，竟不打招呼上书告我们，气死我了！”她骂着吃，吃着训，说：“从《共产党宣言》到《国际歌》，再到鲁迅，真正称得上马列经典的文艺著作并不多，而我们的8个样板戏，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

来到大寨第二天，早饭刚罢，便通知我们到礼堂听江青的录音讲话。这个讲话向大寨兜售今天应该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引蛇出洞，放毒草出笼，然后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接着又把话题引到《评〈水浒〉》，声嘶力竭地叫喊：“现在，有人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不怕还乡团，不怕反攻倒算。现在让他们表演，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进行反击，全面反击！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我们感觉杀气腾腾，不知国家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听完录音，又传来指令，要所有人到田间参加劳动。所谓劳动，就是摘花椒。江青摆手把张天民叫到身旁。苏云厂长预感有重要对话，便暗嘱我凑到跟前，把谈话内容记下。于是，树下就剩下我们三个人，江青开始对张天民故作亲近道：“小张呀，昨天我说要教训你，那是开玩笑。今天咱们平心静气地来同志式的谈话，好不好？”张天民有点出乎意料，马上说：“我听首长指示。”江青话奔主题：“当初，我让你们写大庆题材，是要你们照《中国文学》那篇文章搞（指《王铁人的故事》）。那个故事你看过吧？它主要是围绕王铁人来表现的。可你写的那个油娃呢（指周挺杉）？什么会战部署，前线指挥，写了一堆，你把主要人物的成长给丢了，石油史也没写清楚。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超越，不妨再来个新构思，咱们另拍一部新《创业》！”接着她口若悬河地讲起了她的设想和构思，似乎她的创意已成竹在胸。最后她说：“行了，我不替你编了，剩下来是你们的事情了。”在她滔滔不绝的口述中，张天民只是默然静听，没做任何回应。

象征性劳动结束，到下午两点钟，一个特邀长影、北影人员参加的正式座谈会开场，爆出了江青与张天民之间骇人的正面交锋。

会场设在一幢不大的会议厅，我在后排做记录。主角江青一登场，先向《创业》《山花》编导们靠近，营造学术气氛。她张口向北影导演提问：“成荫，你看了《康贝尔王国》感受如何？”这部英国影片歌颂了勇于开拓的英雄气概，成荫回答得干脆利索：“我看不错。故事简洁，刻画人物主要靠动作。”江青点点头，“嗯，艺术上很有特点，你看它表现主角小康贝尔，一上场病病恹恹，还带有书卷气。争夺石油王国的矛盾一展开，他精神面貌完全变样了！——张天民，你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醉翁之意不在酒，江青急速转移箭靶：“噢，你感受很好，不讲了。张天民，现在我问你，在你给主席写信前，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张天民一震，回话：“没有。我没听到什么消息。”江青眼一瞪，抬高嗓门：“没听到？没听到什么就敢写信？你斗胆！”天民说：“我是没听到，真没听到什么。”江青突然开诈：“你说，你是不是捉刀代笔？”天民愕

然，软顶道：“捉刀代笔？没有。信就是我自己写的。”江青几乎是在审问：“那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写的信？”天民答：“7月18号。”江青冷冷一笑，面色冷峻得可怕：“看看，你7月18号写的信，主席25号就批了，仅仅7天，背后没有人指点，没人传递，谁信哪？嗯？”

全场霎时阴云密布。所有人屏声息气，在紧张地关注。

江青似乎觉察在众目睽睽之下逼供，有失体面，于是口气变缓地对张天民说：“这件事，我知道你不会说。我也不再追问。不过，迟早有一天，你会告诉我的！我再问你，你还给不给主席写信了？”天民答：“不写了。”江青大声说：“不，你还要写！你要向主席报告，《创业》虽没大错，还有小错，要求重拍一部新《创业》。你还要向主席建议，原影片不要向国外发行。信的抬头，还要写党中央。”江青说完，一阵冷场。

就这样，一场短兵相接的“预审”就此打住。转而再让大家座谈影片时，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

◇ 批邓阴风的前奏

江青召见的第三天，出现两道景观：明场，由于会咏主持，会聚来大寨的作家、编剧，根据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精神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研究如何抓好创作。这种故作姿态的座谈，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江青为应付毛主席批示的遮羞表演。而暗场，则是江青通过王淮湘给张天民施压，逼他再给毛泽东写信，以形成自打耳光。

我傍晚溜出宾馆见到天民，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王淮湘遵从江青旨意，要我再给毛主席写信，承认《创业》没大错，但有小错。要求再拍一部新《创业》。还让我自己提出，影片不要对国外发行。”此话我一听就愣了，问：“要干吗？哦，主席说此片无大错，让你说还有小错。主席说建议通过发行，你说不要对外发行。这不是让你来否定毛主席的批示吗？”天民一脸愁容道：“开始谈，被我顶回去。刚才，王淮湘又出马，说这是首长意见。而且还说，写信要快，不写只怕离不开大寨！”我眉头一皱，“啊，还威胁？”为减轻天民压力，让他心里有底，我当即把最近听到关于美国记者维特克采访江青拟出书引发毛泽东震怒的信息向他传递，并和他一起评估分析形势。回去时候，天民一扫低迷情绪，振作地自语：“嗯，没什么了不起，我不会让他们满意的！”

召见第四天，夜色朦胧中，驶进大院的高级轿车结队连排，宾客、记者接踵穿过堂阶。幽暗的灯光下，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清华、北大的“梁效”写作班子，参加创作座谈会的作家，昆曲录音组的演员、作曲，还有长影《创业》、北影《山花》组的成员，100多人比肩簇拥着在餐桌前坐下，将聆听江青今天的重要讲话。

江青开腔了：“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在我们党内，斗争曲曲折折。就在最近，有人把我江某人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这封信还没有经政治局讨论，居然给公开了！”最后一句话，声音特大，几乎是喊出来的。

此时我背身刚要笔录，一声尖叫：“不许记！”吓了我一大跳。

江青稳稳神，继续说：“外电评论说，我们党内有两派，一个是温和派，另一个是激进派。激进派就是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我！”

这位“左派领袖”逐步把话题点明，她说：“最近发表了毛主席的《评〈水浒〉》。

《水浒》里的头目宋江，置梁山寨主晁盖于不顾，也不把一百单八将放在眼里，将大名府的卢俊义请上山，想叫他执掌大权。卢俊义是什么人？是大地主大官宦的孝子贤孙，也是屠杀方腊起义军的刽子手！把这种人请上山干什么？就是要让他来造无产阶级的反哪！你们可以看看，他招降纳叛，网罗了一些什么人？都哪些乌龟王八蛋进了政府？所以我们说，宋江是投降派。宋江投降，架空晁盖，这就是《评〈水浒〉》的要害。”

她接着说：“同志们，投降派不可怕，我们要通过学习《评〈水浒〉》来揭露他。现在，我们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有起伏，有曲折。有人不是在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些人是还乡团，他们妄想反攻倒算！毛主席交给了我们斗争的武器，那就是丢掉幻想，准备反击！”“我们一定要反击！不然，他们上台，我们就得坐牢，就要掉脑袋。但是我不怕，主席万一百年，或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大不了自杀。不过我还不能死，要跟他们斗！斗争就会有牺牲，所以死也不怕，就怕不死不活折磨我，那还不如挨骂。”“我呀，天天有人骂，帝国主义骂，修正主义骂，共产党员还能怕挨骂吗？现在，社会上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自杀了，送到纺织厂劳改去了，真是笑话！在座的，你们听见谣言没有啊？”

大厅里出现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江青不见回应，就直接点名：“成荫，崔嵬，你们听到没有？”北影这两位大帅连连摇头。江青呵斥道：“没听到？谣言你们北影就有！还有东方歌舞团，有个姓王的女人，坏透了，也造我的谣！造文化部的谣！说呀，你们谁听到了？噢，都不吭声，好哇，张永枚，你站起来说，都听见了什么？”

诗人张永枚个儿不高，穿绿色军装，听见点名，当即站起，毕恭毕敬。他毫无惧怯，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慷慨陈辞：“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一生没有个人的敌人，他有的都是阶级的敌人。我们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也没有个人的敌人，她有的都是阶级的敌人……”江青不耐烦地把他的话打断：“行了，行了，谁叫你讲这些？我是问你，你听到过什么谣言？”口才流利的张永枚，瞬间张口结舌：“他们说……”江青急不可耐地问：“他们说什么？”诗人吞吞吐吐：“他们说，说……”江青吼叫：“说什么？你说呀，哑巴了？”张永枚被逼不过，只好说：“他们说，说文化部是个‘大行帮’！”

江青大叫：“不对！你没说实话，那天你是怎么说的？啊？”她决然地自我爆料道：“他们骂我是武则天，是吕后！同志们，吕后是什么人哪？她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她聪明能干，有法家头脑，辅佐刘邦，打败项羽，稳固了汉朝政权。我怎么比得了吕后呀？——不过，我是共产党员，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上，我比她强！”

等我们目送江青离去时，她行至门口，突然转身，扬手发出一声尖叫：“不许挑拨离间！”这神经质式的咆哮，差一点把端盘子的女服务员吓倒。

9月20日一早，我们便依照事先安排乘专列离开大寨。专列驶出娘子关，忽然在距石家庄不远的小站停下。随员通知大家，首长要在这里睡午觉，不许喧哗。专列何时开，要等首长发话。

5天的大寨召见结束了，而围绕江青对《创业》的蓄意反扑，和借《评〈水浒〉》策划的“反击”阴谋，随之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了批邓的序幕。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迅猛展开。这期间，江青始终对《创业》耿耿于怀，什么“主席7·25批示来路不明”，什么“授意张天民写信的指使人就是邓小平”等等诬言，又把《创业》作者推到了被追查的漩涡中。历经颠簸考验的张天民，不止一次地顶住了江青的打击陷害与复

仇反攻。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为拍电影《创业》遭难的人们，才算彻底告别了可怕的梦魇。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6期

~~~~~

## 【春秋史笔】

### “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 罗 韬 ·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四人帮”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进入最后阶段，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实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同年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在坚持“文革”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的全部内容。

#### 一、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反复变动后形成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p674）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这一次整风，对国务院领导人来一次大“洗澡”。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试探，其他副总理也至为紧张，李先念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见上引薄著）“办事”二字是金诃！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

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自从与苏联产生意识形态争论之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这一态势是从“九评”以后逐渐形成的。从1962年到1966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文件，包括“九评”中的多数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组长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起草，由邓小平、彭真等主持审核的（见吴冷西《十年论战》，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是，尽管江青要周恩来像对中央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但其实“中央文革”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并没有继承书记处的事权。只是“中央文革”把“言权”清晰地独立出来了。

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各军区司令员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形式主导地方政权，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军官离开政府，军人回到军营。这时国务院的事权比“八大”时期与“九大”时期都更完整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 二、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随后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发表于《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并发行了单行本。以如此显要的方式以个人名义发表理论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

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提出观点，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比如抓住“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纷纷发起批判，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从攻防双方来看。言官系统把握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作为根本依据，祭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武器，打击事官系统。反之，事官系统也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基本依据，以批判“教条主义”为武器予以反击。

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事官多处于守势，言官多处于攻势。

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据王力回忆：“总理常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就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于中央文革，陈伯达无所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她定了总理就办。连对张春桥，总理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王力反思录》，p679）“事务主义者”的帽子几乎是他的护身符，因此也减少了许多根本冲突。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他以举重若轻著称，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0月5日，邓小平就创办《理论战线》一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划了一个圈。对于这个圈，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乔木，都理解为同意了。连后来的史书如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也这样认为。其实，毛泽东这个圈是不能被认为是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年间，王力与周恩来讨论过毛泽东划圈的涵义：凡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见王力前引书，p572、p1029）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并说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

解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

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 三、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这是他无法解决的缺陷。

毛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据吴德的记录，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有这样一段话：“历来我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本主义法权。谁过急就要摔下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63）。“安定团结”的真实含义还包含了更深一层含义：“熬”，最后经过“十年八年、二十年”，熬过那些“老事官”。王洪文对此是理解的，他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这话很快传到邓小平耳里，当时就与李先念谈这事，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看，我们斗不过他们呀。王洪文这句话对邓小平很刺激，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多年，还多次提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92、p225、p280）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这一段话是话分两头，对

言官说，“老同志还有点用”。更重点还是对老事官说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响力不减。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 四、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对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有深深自信。经过“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等一系列从理论到组织的措施，在中央委员会内，意识形态的左倾强势已经基本形成，而将来统率这一思想体系的，就是“言官系统”。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灵前所献的花圈特意以“文官果”花束做成，似乎也是向全国宣示毛泽东内心的这重心愿。真正得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真传的是这些掌握理论的“文官”，这些无武的“随何、陆贾”。

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他们是寄望甚殷的。开过“十大”以后，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吴德等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1、p224）。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新事官。吴德没有明说与他一起受毛泽东嘱托的还有什么人，按理不会是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首先，他们没把华国锋看在眼里，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也只是“办事”而已，理论水平欠奉。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0）可见，新老事官之间，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请张玉凤吃饭，席间忘乎所以地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文革”期间确受过审查）。张玉凤随后向汪东兴汇报了。而王洪文、张春桥与军事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许世友最为耿直，不假辞色，在1973年8月推选十大副主席时，许世友明确反对推举王洪文，张春桥起而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斥责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祝庭勋《李德生：动乱岁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这批新事官，与四人帮的矛盾一点也不亚于老事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王洪文他们要等老事官们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时机。

“文革”至此已经十年，它的理论已经显出了论高难行的尴尬，“文革”实践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专横、张春桥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浅无知，姚文元书生不实，都为新老事官们所厌恶，当这伙人在毛泽东羽翼之下，事官们都隐忍不发，但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叶剑英、李先念，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随何、陆贾又怎敌周勃、灌婴呢？

## 五、余论

历代都有言官，也都有言事矛盾。言官往往因自恃掌握真理，高屋建瓴，放言高论，势如破竹，让事官们动辄得咎；而操办实事的官僚对言官的不切实际、空言误事也深恶痛绝。李鸿章说过：“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前明之亡，实亡于言官”（《庚子西狩丛谈》，p751）李鸿章一生受了不少言官的攻击，所以攻击言官也最力。周恩来抱怨战略家太多（王力前引书，p679），邓小平也不喜欢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华国锋索性就把理论家抓起来了。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而“四人帮”产生于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有着空前高的霸权，坐上了“政委”的地位，等于言官气势压住宰相，他们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原话是“常鄙”，被毛泽东改为“常恨”，换一个“恨”字，就更觉得像一句谶语了。

□ 原载《南方周末》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